

# 怎样看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蒋介石

张亦民 陶中亮 胡萃萍

怎样看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重新认识和评价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是非功过是很有必要的。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着国内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其抗战目的和出发点存在着根本差别。因此,在日本侵略面前,围绕着如何解决民族矛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坚持的片面抗战路线。

本文谨就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抗战不同阶段的反映,试以历史的分析和考察,以求教于抗战老人和史学界。

## (一)

抗战初期,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为止,即日寇处于战略进攻和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动员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这个评价是公正的、客观的,主要表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承认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并给八路军、新四军一定的薪饷、子弹和药品;允许我党在国统区办报纸和发行书刊;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使我党一部分长期被关押的优秀干部如王若飞、陶铸等走上抗日领导岗位;抗战初还召开了国防会议,以后又组织了国民参政会,吸收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一部分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抗战工作等等。在军事斗争上,“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对

日寇抱有幻想,企图以妥协解决中日战争,但在寻求妥协的同时,毕竟没有放弃抗战,并且比较努力。

日寇向我芦沟桥发动进攻,蒋介石在庐山得悉其梗概立即命令宋哲元进行抵抗,但从陈布雷当时的记载看,当时总的政策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反映了蒋介石既要抵抗又想妥协的矛盾心态。当时,日军在华北驻军只有六千人,而二十九军拥有步兵、骑兵、保安部队等,相加约有十万人,照例是可以战胜的。但是最终在“不扩大”的妥协思想影响下,我军延误了战机。日军则利用谈判时机,从本土及东北向华北大举进攻,扩大了战火。

八月十三日开始的淞沪战役,历时三个月,使日寇以四万余人的生命代价才占领了上海。“八一四笕桥空战”的全胜,忻口战役的顽强守备,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等战役的阻击与防御作战,彻底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和三月亡华和侵略计划。

但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陷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虽经国民党广大官兵英勇抗击,但还是免不了大溃退,丢掉了中华大地的半壁河山,这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之外,国民党本身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是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一、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战场基本上采取“堵”或“顶”的办法,打硬仗,拼消耗,缺乏战略战役的全局布置。如淞沪战役,国民党军一方面是顽强坚守,投入四十万兵力,使敌人付出惨重伤亡,另一方面日军利用国民党一股劲地向上海增兵的时候,在没有很好布防的杭州湾登陆。随后,国民党军又想依靠苏(州)嘉(兴)防线的堡垒工事来抵御日寇进攻,日军则分头向上海、南京包抄,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杭州,使京、沪、杭三角

地区全部沦陷。二是在政治上长期受不抵抗政策影响,宣传的是民族失败主义,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国民党军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战争初期部分国民党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如山东的韩复榘、张北的刘汝明、大同的李服膺、河北的刘峙等都是国民党战场著名的“长腿将军”,一溃千里的“逃将”。三是单纯军事观点的片面抗战路线,不仅不注意发动群众,甚至采取有损群众利益的行动(如花园口决堤),失去了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援。

## (二)

1938年10月至1943年底,从武汉失陷到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前的战略相持阶段。

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对这一阶段的评价是:“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这一阶段国民党抗日总趋势是倒退,从努力抗战到消极抗战,从联共抗日到积极反共,甚至借日限共灭共。

国民党何以会倒退?大致出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日本改变了战略方针。侵华战争开始,想以“速战速决”办法占领中国,但未获成功。鉴于军事、经济实力的不足,日军难以扩大侵略范围,被迫停止战略进攻。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调整日华新关系,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缔结日中两国反共军事同盟,并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露骨地反映出日本使用武力未达到目的,而急欲改变以政治诱降的办法解决“支那事件”。此后,日本对国民党就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把军事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这一方针的转变,对国民党亲日派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并从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汪精卫就是在这种政策引诱下投降了敌人的。至于蒋介石,一方面表示继续抗战,另一方面怂恿国民党军政委员继汪精卫之后,接踵投敌,妄图用“曲线救国”来安抚日本,并达到“防共反共”目的。

第二,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迅猛发展。中共力量的壮大既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也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恐惧和仇视。抗战开始,蒋介石之所

以同意国共合作,并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到敌后去开辟战场,本来就有借刀杀人的企图,妄想借日寇之手,限制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严酷的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和消灭,相反地在抗战中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和壮大,从抗战开始到国民党撤离武汉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十八万人。

第三,美英对华政策的影响。1939年欧战爆发后,英国为全力对付希特勒,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与日本搞妥协。同时,采取了封锁滇缅公路办法,压蒋介石对日妥协,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以后与美国一道搞起“远东慕尼黑”阴谋,“敦请中国议和”。国民党就在日本投降,英美劝降的背景下,把共产党视为妥协的障碍而转向反共的。并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随后,反共活动逐步升级,继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当然,在这个阶段是既要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方面,也要承认其仍在坚持抗战的方面。这个时期日军对国民党战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使发生一些战事,日本也只是为了巩固其占领区而发动,所以国民党军与日军双方均未形成大规模的进退。

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根据同盟军协定,组织了远征军到缅甸、印度协同英美等盟军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那里的战局并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 (三)

从1944年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到日本投降,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作了这样评述:“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国民党顽固派越到抗

战后期,越与日伪貌离神合,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或明或暗地联成一气反对共产党。

1944年以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德战争开始向德国境内推进,国内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国际国内的矛盾中心都开始转向战后格局的安排上。如国际上有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国内有国共分别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和共产党的“七大”,都是围绕着战后前途命运来安排的。抗战越接近胜利,国民党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越是害怕和忌恨,越是从消极抗战转到积极反共问题上来。其主要表现:

1、对日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坐待胜利。1944年春,日寇在日暮途穷的形势下,作为最后挣扎,开展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在河南战役中,处于攻势的日军只有五万人来,而国民党汤恩伯、蒋鼎文所部有四十万人,本是可以挫败日寇计划的,但在消极避战,坐等胜利的指导思想下,没有很好交战,就望风而逃。之后,他们之间又相安无事,汤恩伯的代表经常秘密奔走于南京和安徽界首之间,一面谈判共同“剿共”问题,一面在界首设置关卡,进行走私活动。在湘桂方面,因危及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迫于需要作过抵抗,但未获成功。这样,从1944年4月到1945年2月的十个月中,国民党政府放弃了豫、湘、桂、粤等省大部分和贵州一部分领土;加上日军为掩护这次战役而发动小规模进攻占领的温州、福州等地在内,失陷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丢掉大小城市146座,六千万同胞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

2、积极反共,把主要矛头对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大溃退的同时,解放区战场对日寇展开了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从河南撤退地区夺回大片领土,恢复和扩大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新解放区。共产党为了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在1944年秋以后,派出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湖南,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派出新四军一部南下苏浙皖边界,建立苏浙军区,开展东南沿海诸省抗日游击战争。通过这两支部队与南方游击队配合发展华南、东南形势。但是,国民党在日军进攻面前消极避战,而在共军向敌后挺进中,却百般阻挠破坏,将湘桂战役中败阵下来的部

队专门用来“围剿”中共“南下支队”,调集顾祝同部队向中共苏浙军区发动围攻。

3、在美国支持下,实行蒋、日、伪合流,向共产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形势发展出于人们预料,日本投降来得很突然,国民党蒋介石居然从避战、观战中等来了胜利。但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龟缩在大西南和西北部,而日占区则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包围之中,这种态势对国民党接受日伪军投降很不利。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与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在美国支持下,从空中、海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和沿海各大城市;另一方面不惜与日伪军勾结共同对付共产党,要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集团投降,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日、伪军利用蒋介石反共心切,积极听从,百般讨好,献计献策对付共产党。如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就曾在抗战胜利前夕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等等。可见,蒋、日、伪合流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反映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同国民党顽固派双方战略方针转变的思想渊源。

#### (四)

综观上述几个阶段,谈几点认识:

1、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总体上是应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在抗日中坚持反共,但不应以反共而否定抗战。就抗战与反共来说,也经历着一个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战到中后期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充满着对日本既要战、又妄图在一定条件下妥协求和;对共产党既要联合抗日,又妄图借日限共、反共和灭共的种种矛盾。这是国民党在当时历史条件和世界大国影响下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的反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推动时局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蒋介石能够接受国共合作的主张,既有被迫的方面,也有自觉方面。为了解决民族矛盾,有抗日要求,他没有理由拒绝深得全国人民支持的国共合作的倡议;但又感到共产党是他心腹大患,不能不对共产党有所限制,于是便想在联共抗日中削弱和融化共产党,这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制订

一切方针政策的立场和态度,也是其在抗战时各个阶段方针政策演变的基本依据。

这里需要指出,抗日战争越接近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反共越厉害,这是与美国对华政策上全力支持和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分不开的;加之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缺乏足够认识,在客观上也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否则,战后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2、在肯定国民党坚持抗战的同时还要充分看到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英勇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优良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涌现出象淞沪抗战中守卫宝山的整营官兵壮烈牺牲和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抗日壮士的光辉事迹,而且有几十名高级将领殉职于抗战前线,如在南苑战役中牺牲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忻口战役中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54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体官兵;入缅参战的第五军200师师长戴安澜等,他们为国捐躯,永垂抗战胜利的史册。

延安《新中华报》曾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3、国民党正面战场有过抗战初期和1944年的两次大溃退。对于这两次撤退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把撤退和失地作为衡量作战的是非标准。特别在敌强我弱,敌人有预谋有计划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初期,丢城失地的情况在战史上是常有的事。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武汉会战问题指出:“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放弃地方保存实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可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撤退一些地方在战略上是允许的,笼统地把撤退说成逃跑是不公正、不确切的,至少对第一次大撤退应作这样的分析。

4、关于国民党寻求同日本妥协的谈判问题。在抗战中蒋介石集团确实存在着寻求妥协求和而始终进行着秘密谈判的问题。这方面,日本在战后公

布的许多材料和英国历史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写的《通敌内幕》的专著,都作了充分的披露。然而,即使这样,对于敌人的秘密谈判也要作具体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的谈判,关键在于谈判的结果。为了避免战争,在不妨碍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妥协是允许的。国民党同日本的秘密谈判,各个阶段的目的,出发点也不完全相同。抗战初期是围绕着“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一面派高崇武到香港同日本谈判,一面寄希望于“九国公约”国家会议来制止日本侵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对内搞反共活动,对外宣扬“体面和平”、“国际调停”的舆论。但日本条件太苛刻,妥协未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政府转变为援华抗日的方针,国民党的和平妥协调子也随着下降。但蒋介石在1942年1月还宣称:“中国对日牺牲重大,如果再无援助,中国便单独媾和。”此话要从两方面看,一是表现妥协倾向没有彻底消除,另外更重要是讲给英美听的,是要他们的援助而敲竹杠的话,不能视为欲降的姿态看待。抗战后期,也就是1944年以后的谈判,其目的、内容已从和平妥协转到同日伪勾结联合反共、谋求同日伪配合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上来了。

同蒋介石妥协投降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曲线救国”的问题。这个提法最早见于1938年张荫梧给何应钦的电报,指出“柴恩波为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敌寇接洽。”其实质是联日“防共、反共”。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固然是“曲线救国”的一种表现,但至今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是蒋介石指使他们投降日本的,也均非蒋的嫡系,因此不能把“曲线救国”看成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体。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以胜利而告终的民族战争。这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今日海峡两岸的分离,是民族的不幸,历史的悲剧,愿海峡两岸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象抗日民族战争那样,团结合作,促进祖国统一,迎接中华盛世。

责任编辑:周明